

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

许 怀 林

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,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和提倡,迅速在我国各地传播开来,流毒极为深广。有时候,由于争夺财富和剥削对象的矛盾,封建朝廷偶尔采取过毁佛的措施,但是为时极短,很快重新恢复,泛滥起来。封建士大夫之中,许多有识之士排佛,但是也有大批人信佛、扬佛,认为它有益于治道,例如,刘禹锡说:佛教能“阴助教化”,可以起“刑政不及”的作用^①。于是,“天下名山水域为佛地者什有八九”(李觏《修梓山寺殿记》)。在江西境内,不仅寺院众多,而且有不少海内名刹、高僧,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本文试就五代以前佛教在江西传播的情况,它与其它社会条件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,描述一个大概轮廓。由于篇幅、特别是学力上的限制,一些更深入细致的方面、佛教经论义理上的问题,全都略而不谈。错误的地方,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

据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121至125的记载,江西地区从东汉末年(公元二世纪)至清朝后期,陆续修建而留存、记载下来的寺院、宫观,合计1517所,其中佛教寺院1115所,道教宫观402所。在佛寺中,东汉至南朝时期建立的96所,隋唐五代时期建立的483所,宋以后的共536所。五代以前建立的寺院在全省各地(按照清代后期的府州建置排列)分布的情况如下表(见下页)。

《江西通志》所记的寺院,只可能是实际存在过的寺院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,至于那些存在时间较短,或因缺乏记载没有流传下来的寺院,自然是不包括在内。例如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说晋代赣州城内有安天寺,“以间计者二千六百,盖章贡兰若之甲。”《江西通志》就漏记了。就通志所记的这些数字,我们已能得出一个印象:佛教开始在江西传播的时间很早,东晋南朝时期已趋普遍,唐朝时期达到鼎盛阶段。

大约是在汉武帝时期,佛教传入我国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,我国最早的佛寺是洛阳白马寺,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。而《江西通志》说,彭泽县安禅寺,创建于“汉永平间”(公元58—75年),浮梁县双峰寺建于桓帝元嘉元年(公元151年),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寺院。当然,那时佛教初传中国,活动范围主要是长安、洛阳地区,地处江南的我省是否同时建有寺院,似可存疑。然而,佛教史籍中记载说,西域僧人安世高在桓帝建和初年(公元147年)至灵帝建宁中(公元170年前后)在洛阳译经讲经,随后南游豫章、

东汉至五代时期江西各地寺院分布表

地 区	时 期							合 计
	东 汉	吴	晋	南 朝	隋	唐	五 代	
南 昌 府			16	6	3	52	2	79
瑞 州 府			2		2	21		25
袁 州 府		1	1	1		23	1	27
临 江 府			2	1	1	13	3	20
吉 安 府		5		1	1	67	11	85
抚 州 府			2		1	43	3	49
建 昌 府						27	10	37
广 信 府			3	2		42	5	52
饶 州 府	1		1	14		57	6	79
南 康 府			3	3	1	20	1	28
九 江 府	1		21	1	1	21	11	56
南 安 府					1	7	4	12
赣 州 府		1	2	3		16	4	26
宁 都 州			2			2		4
总 计	2	7	55	32	11	411	61	579

浔阳、会稽等地。参考这点记载，桓、灵时期江西有佛寺的说法，也可相信。

三国吴统治时期，佛教传至江西的史料已经逐渐丰富翔实。这时江西境内已有佛寺七所，其中在赤乌年间（公元238——251年）建造的五所，即庐陵的南塔寺、崇恩寺，泰和的崇福寺，永新的松林寺，信丰的延福寺；在建兴二年（公元253年）建造的是庐陵的东山禅寺，宝鼎年间（公元266——269年）建的是分宜福胜寺。南塔寺的“塔顶以赤乌纪年，砌砖亦有赤乌字”；延福寺有石塔高九级，“砖石间有字可识，曰扬贯重修。又有赤乌年号。”从东汉到孙吴的百余年间，佛教开始传入我省，寺院不多，但是从北部的彭泽、浮梁，到南端的信丰，都建有立足点，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始基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在我国发展泛滥，从朝廷到郡县，从关陕到江浙，到处崇佛佞佛，寺院多，僧尼众。这个时期江西建有寺院87所，分别座落在南昌、萍乡、吉安、崇仁、鄱阳、乐平、瑞昌、湖口、赣县、宁都等32个县内，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，一是以南昌

为中心,包括南昌、新建两县,有寺17所;二是以庐山为核心,包括九江、星子两县,有寺21所;三是鄱阳、余干两县,集中了14所肖梁时期建造的佛寺。这三个集中区以庐山地区最为重要,影响也更深远(详说见后)。从寺院集中的情况来看,南昌、九江、鄱阳三个地区都是江西开发最早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,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佛教徒,却善于选择富庶的地区寄生,宗教的传播也要以经济为基础。

隋唐五代时期,佛教在我国各地泛滥猖獗的程度,比前期更加厉害。仅就寺院数量上看,江西这时期共建寺院483所,是前期总数(96)的五倍。按唐代江西八州三十七县计算,平均每县达13所有余。宋朝人说:“江西多古尊宿道场,居洪州境内以百数”(黄庭坚《云岩禅院记》),“庐阜招提三百所”(王十朋楞伽院诗),这虽然是概括性的泛指,但是也反映了唐朝以来寺院众多的情景。数以百计的大大小的寺院,密布于全省各地,大有名山胜地僧占尽的趋势。

二

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,是思想统治的工具。佛教传来之后,封建统治者就抓住不放,藉其因果轮回、善恶报应的说教,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,消解人民的反抗斗争。另一方面,佛教是异域的宗教,要在中国立足发展,势必投靠官府和朝廷,正如晋代高僧道安所说: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。”所以,佛教一开始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宗教,僧人基本上是封建统治中的成员,寺院是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。

就唐朝一代的情况看,江西411所寺院在经济中占多大的比重?由于史料缺乏,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。从一些参考材料中,可以看出一个概貌。

武宗会昌五年(公元845年)灭佛,天下共拆寺4,600余所,还俗僧尼260,500,收充两税户,收奴婢为两税户150,000人(《旧唐书》卷18上)。如果据此计算,平均每寺有僧尼56.61人,占有奴婢32.6人。依此标准,计算唐代江西境内的411所寺院,当有僧尼23,266人,占有奴婢13,398人,都约达全国总数的1/10。当时有进士孙樵上言:“百姓男耕女织,不自温饱,而群僧安坐华屋,美衣精饌,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。”^②按唐天宝年间江西境内八州三十七县,共有户298,549,口1,586,257。十户养一僧计算,江西遭受到佛寺僧尼祸害的将是23万余户,约占80%!

再看一些具体事例。黄庭坚曾说“江西多古尊宿道场,居洪州境内以百数。”他在庐山开先华藏禅院记中谈到会昌毁佛原因时又写道:“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,所在常数百,是以有会昌之籍没。”^③这里的所在常数百,不单是指庐山的寺院,是泛指性的。据黄庭坚的这个估计,则是洪州一州境内就将至少有僧尼一万以上了。

白居易《抚州景云寺律和尚碑》说:“如来十弟子中,优波离善持律,波离灭,南岳大师得之。南岳灭,景云大师得之。师南城人,初隶景云寺,徙洪州龙兴,终庐山东林,度娑婆男女万五千人。”^④一个律和尚即剃度僧尼万五千人,江西是禅宗南宗的重要阵地,有一批著名的禅师,所在“禅侣云集”,他们度的男女合计起来又该有多少万呢?

还有一种情况须注意,官府统计的僧尼是住进寺院的僧尼数,那些在家奉佛念经的信徒却没有统计,而这批虔诚的佛子,其数量往往超过出家的僧尼。^⑤

其次,寺院占有许多山林田地,一座寺院就是一个庞大的僧侣地主庄园。一些大寺院拥有

的田产可达“数十顷”，例如南城县显源禅院，创建于“唐天祐丙子”，到南唐时期，“景达以齐王守临川，乃命德琳师以张大其业。……树稼数十顷，立屋累百楹。”^⑥ 寺院的田产来源，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：一种是朝廷官府的赏赐。宜丰境内的太子塔寺，是唐肃宗第十四子僖禅师居住地，得“赐田甚广”。据《唐六典》载，开元十年（公元722年）规定，道士给田30亩，女冠20亩，僧尼亦如之。照前述的估算数字，江西二万三千余僧尼，当占有60余万亩田地。僧30亩，尼20亩田的限额是相当高的，加上免赋役的特权，足以保证他们过富裕生活。我们可以用北宋时期的人口、土地数字作个比较。元丰年间（公元1078—1085年）江南西路官民田45万余顷，人丁300余万，平均每人约合11亩余，仅及唐朝和尚占田数的1/3。然而江西在宋代是土地全面开发的时期，许多山地开垦成为梯田，45万顷的数字已接近极限数。由此可见僧尼们占田的比例相当大了。

另一种途径是官贵富有人家的施予。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教，既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作辩护，又是对农民大众进行欺骗，要他们安于现状，于是“丰家巨族有轻财乐施之士以相之”，例如峡江境内的东平寺，是唐代仰山慧寂禅师居住地，号称“仰山祖庭”。贞观年间（公元627—649年）新喻欧阳文长“见师行精专，捐近寺庄田，计租米一千余顷（石？），供佛斋僧”^⑦。欧阳文长一下子捐赠一千多石租的田地，按对半租计算，合二千余亩，那末东平寺拥有的田产总数将更巨大，可见寺院经济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，佛教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宗教，而农民则承受着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的双重剥削。

庐山东林寺，从东晋创建时起，一直得到官府支持，是资产雄厚的海内名刹。南朝肖梁时期，建安王别驾张孝秀“去职归山，居于东林寺。有田数十顷，部曲数百人，率以力田，尽供山众。远近归慕，赴之如市。”（《梁书·处士传》）一家即给数十顷，合计远近归慕者施舍的数字就更惊人了。历三四百年之后进入唐朝，仍然兴旺不衰，江州的刺史照例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助。唐宪宗时，洪州观察使韦丹的夫人肖氏，“于荆州买良田数顷，收其租入以奉檀施”。元和四年（公元809年）以后，韦丹又以官俸资助它建藏经阁，收贮全部佛教经论著述。此阁“工饰之美，虽两都四方，或未前见”（《白氏长庆集》卷26）。建阁写经，耗费田租、官俸之巨，可以想见。后来白居易的《文集》60卷，《后集》10卷，也送来这里入藏，“依《远公文集》例，不借外客，不出寺门”，以示他景慕慧远，信仰佛法之意。武宗灭佛，东林寺也遭打击，但随即复兴。江州刺史崔黯奉宣宗诏令，重新鸠工修建，“下度江之木，鸠食访工，陶土冶铁”，历时六年，新建屋宇313间，共役工65万余人^⑧。

大规模的营造寺宇佛像，耗费不可胜计的铜铁漆纒，是佛教蠹蚀社会财富的罪证，也是寺院占有巨量财富的一种反映。庐山东林寺以铁铸罗汉像，共计五百尊；南昌普贤寺，袁州刺史边镐以铁20万斤铸成普贤菩萨像供奉……。

上述各例，都只是说到一人一事，没有谈及该寺院财产的全部。但是，已经可以窥见到寺院占有的田地之广、拥有的财富之巨。唐中宗时辛替否上疏说：“今天下之寺无数，一寺当陛下一宫，壮丽用度尚或过之。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”（《新唐书·卷118·本传》）这个估计是不过分的，然而令人吃惊。

佛教是封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，所以寺院能够拥有大量的田产，隐占众多的人口。当其泛滥成灾，过分膨胀，就威胁着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和劳役数量，社会阶级矛盾就将激化起来。黄庭坚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敏锐地用唐朝的历史批判宋朝的现实，提醒统治阶级注

意，他在前引的开先寺（秀峰寺）记中说：“今也毁中民百家之产而成一屋，夺农夫十口之饭而饭一僧，不已泰乎？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，所在常数百，是以有会昌之籍没；穷土木之沃，龙蛇虎豹之区，化为金碧，是以有广明之除荡，可不忌耶！”佛教与儒学同样，都有利于封建统治，是“殊途而同归”的，但当佛寺穷极奢靡，为了争夺财富和劳动力，封建王朝也会偶尔采取“籍没”措施；而农民大众一旦承受不了压迫的负荷，就要武装反抗，黄巢农民军横扫中原，在广明元年（公元880年）攻下长安，唐僖宗落荒逃跑，封建大厦倾覆，寺院又怎能保存，“可不忌耶”！这是在提醒佛教和封建统治者都应注意。

三

佛教在江西的传播，不仅仅是以僧尼寺院众多而为人们所重视，更重要的是有一批高僧名刹，在中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见称。东晋时期的东林慧远，唐五代时期的马祖道一、青原行思、百丈怀海、黄檗希运等等，都是久负盛名，影响深远的佛教人物。

庐山自古是神仙窟宅之地，僧道乐趋，寺观林立。东晋时代，与建康一起成为江南佛教的中心，著名的寺院如大林寺，西林寺，归宗寺，东林寺等等，其中以东林尤其突出。东林寺建于太元九年（公元384年），闻名于世已经一千六百年。

寺以僧传。东林寺出名，与创建者慧远密不可分。慧远（334—416），俗姓贾，雁门楼烦（今山西宁武县附近）人，是东晋杰出的佛教学者道安的徒弟。他本是“博综六经，尤善老庄”的儒家，当听到道安讲《般若经》后，豁然大悟，叹曰：“儒道九流，皆糠粃耳！”遂与其弟慧持弃儒入佛，削发为僧。慧远到庐山后，以江南佛经稀少而残缺，特派弟子法净、法领等远出西域，去天竺求取众经。又与长安的鸠摩罗什书信往返，探讨经义。还迎请佛陀跋陀罗等人到东林寺中译写经论。慧远利用他“内通佛理，外善群书”的广博学识，率众行道，倡导念佛法门，在社会上名气很大。东晋末年，操纵朝政的重臣桓玄，下令甄别寺院，裁汰僧尼，但独尊“庐山为道德所居”，视为例外。不少名重一时的官贵和学者，如彭城遣民刘程之，豫章雷次宗，雁门周续之，南阳宗炳、张诠、张野，皆“弃官舍缘，来依远师”。元兴元年（公元402年），慧远和他们于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，期生净土，结为白莲社，参加者据说有123人^⑨。慧远主张以罪福报应导俗，以禅观念佛入真，认为人死（涅槃）是“生绝神冥，形尽神存”，精神还可以转移到别一个形体，继续存在下去。后来的净土宗受其影响，称净土宗为莲宗，宋代的净土宗人排定本宗传法系统，追尊慧远为始祖，把东林寺看成净土宗发源地之一。慧远于义熙十二年（公元416年）死，在东林寺居住三十余年。他是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学者，也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个高僧，对江西佛教的传播实有开辟之功。李泰伯是这样评论他的：“噫！汉初传佛道，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。……当是时，谓之何哉？外国之神而已。及东晋、宋氏，其法乃大。盖慧远居庐山，名虽为释，实挟儒术，故宗少文就之考寻文义；周续之通五经、五纬而事之，雷次宗亦从而明三礼、毛诗。儒者尝为弟子，其人得不尊乎”^⑩，泰伯的评论表明，慧远在佛教界的影响，远不限于江西境内。

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由于儒者的笃信，更由于统治者的宠爱，遂广泛传播，并逐渐被改造得更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，这便是禅宗的形成，而江西则是禅宗的重要基地。

禅宗自始祖菩提达摩起，经四传至弘忍，是为五祖，弟子中以神秀、慧能最著名。他临死前秘密将法衣（袈裟）传给了慧能，命他潜往南方，神秀为争当法嗣，派人追赶，不及而返。神秀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，弘扬渐修的主张，慧能提倡的顿悟之教，主要在江南流传，从此禅宗分成南北二宗。两派斗争了很久，到慧能弟子神会手上，南宗才压倒北宗，争得正统地位，认定慧能是六祖。慧能死于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，柳宗元为撰碑铭说：“今天下言禅皆本曹溪。”（慧能后来定居广东韶州曹溪宝林寺）^⑩唐宪宗时谥为“大鉴禅师”。南宗禅的广泛流传，并取得独尊的地位，是在慧能弟子及再传弟子的时候。在他的许多弟子中，后来传法系统特别发达的是怀让、行思二人。

怀让住南岳，入室弟子六人，以道一居最。道一（709—788），四川什邡县人，本姓马，后世称马祖道一。他原来是北宗禅，后到怀让门下，仍整日坐禅渐修。一日，怀让故意在他面前磨砖，道一问“磨砖作么？”怀让答“磨作镜”。又问：“磨砖岂能成镜？”怀让反问：“坐禅岂得成佛？”道一惊愕不已，终于顿悟到成佛不必坐禅。慧能的主张是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无真佛，向何处求佛。”即是说众生皆有佛性，净心自悟，便可成佛。所以他认为，“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”，如果“自不求真外觅佛，去觅总是大痴人”。既然只要觉悟自己的‘佛性’，坐禅就是痴人自寻烦恼完全没有必要。道一从怀让磨砖之喻领会到祖师简易直捷的成佛秘诀，心意超然，甘心侍奉他十年，精通了南宗禅的见解，便往福建建阳，不久迁居江西抚州、南康、南昌各地，广收门徒，大讲禅学，被称为江西马祖。在南昌、新建、丰城、靖安、修水、金溪、万载、星子、都昌、永修、九江等县，都有相传是道一居住传法的寺院。他的弟子来自四方，重要的有139人，各为一方宗主，发展成“洪州宗”，南宗禅遂至大盛。道一死后，唐宪宗谥为“大寂禅师”。由怀让而道一，发展成禅宗南宗的南岳法系。

行思（？—740），庐陵人，出家后到曹溪拜慧能为师，得到他“传法不传衣”的遗嘱，回家乡青原山静居寺授徒传法，发展形成禅宗南宗的青原法系。行思死后，在僖宗朝谥为‘弘济禅师’。

南岳、青原两个传法系统，发展到晚唐五代时期，南岳系分为沩仰、临济二宗，青原系分为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三宗，合称禅宗五宗。五宗之中有三宗与江西的关系密切，即是沩仰宗、临济宗、曹洞宗。道一的高足怀海（720—814），福州长乐人，先住靖安石门山，后居奉新百丈山，四方禅众称之为‘百丈禅师’。怀海主张摆脱佛教旧传统的羁绊，“坐大道场，自己作佛。”他在佛教史上的显要地位，是由于他创设禅院，制定《禅门规式》，率先进行禅宗整顿工作，对禅宗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大。唐穆宗谥之为“大智禅师”。怀海弟子灵祐（771—853），往潭州为山（湖南宁乡县境内）居住。灵祐弟子慧寂（814—890），在宜春仰山传法，他们师徒相继，别开一系，称为沩仰宗。五代时期沩仰宗特别繁兴，入宋以后逐渐衰微。

百丈怀海弟子希运（？—855），福州人，住高安黄檗山，进一步弘扬慧能的见解，认为“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”，“佛与众生更无别异”。门下信徒众多，官贵亦属不少。会昌间，裴休为洪州观察使，请希运到钟陵（南昌）龙兴寺，日夕问道，并记录他讲说的内容，写成《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》。唐宣宗谥之为“断际禅师。”希运的弟子义玄，往镇州（河北正定县）建临济院，传播师说，形成一大宗派，称为临济宗。临济宗传播到北

宋时期再分为黄龙、扬岐二派,和原来的五宗合称为五宗七家。黄龙宗起于玉山人慧南(1002—1069),他住修水黄龙山,门徒众多,声望极高,有“黄龙宗派被天下”之称,但仅三传即“名具而实亡”。^⑩扬岐宗创于宜春人方会(992—1049),他初住筠州九峰山,后居萍乡扬岐山。杨岐、黄龙二家开始并盛,后来扬岐独行,又恢复临济宗旧名,继续发展,南宋后期传至日本,至今在日本禅宗各派中势力最大。临济宗渊源于江西,成长在河北,再回到江西,它后期的发展史,即是扬岐宗的传播史。

曹洞宗,由青原法系发展而来。行思弟子希迁,在衡山南寺的大石上结庵而居,称石头和尚,湖南禅众集其门下,与江西马祖并称二大士。石头希迁传惟俨,惟俨传昙晟,昙晟传良价(807—869)。良价,浙江诸暨人,在宜丰洞山传法,弟子本寂(840—901),福建莆田人,住宜黄曹山,他俩师徒相承,形成新的宗派:曹洞宗。曹洞和临济相似,由江西出发,再回到江西,也长期流传下来;影响亦及于国外,五代时传入新罗、高丽,南宋后期传至日本,迄今不衰。

隋唐之际,佛教各宗竞争发展,禅宗独盛。唐中期禅宗分南北二支,为争夺正统地位,慧能险遭杀害。在争夺宗派统治权方面,他们的佛心变成杀心,和世俗地主官僚同样的凶残。敢于从佛教旧说中跳出来的慧能,为防徒子徒孙们重走自己私带法衣而逃的老路,在继续传法制度上再革旧规,他晚年对行思说:“从上衣法双行,师资递授,衣以表信,法乃印心。……吾受衣以来,遭此多难,况乎后代,争竞必多。衣即留镇山门,汝当分化一方,毋令断绝。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五)。和尚无子孙,从达摩以来,他的一件袈裟成了当祖师爷的凭证,让意中人继承宗派统治权,但每次只传一人;现在不传衣,凭各人对“法”的领会程度,凡得到赏识(“印心”)的都可“分化一方”,自立宗派。从此以后,宗派林立,山头众多。江西自行思、马祖道一起,大小祖师,接踵而出,诸方游谈和尚,也就向风景从、汇集于江西,本地人中出家或在家信佛的也就更多起来,寺院遍布,佛事兴盛的局面自然出现。

四

佛教向南方发展,禅宗的众多宗派,以江西为活动中心地区,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?个人初步考虑,下述各点值得注意。

全国政治形势的演变,使江西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地区。两晋、南北朝时期的战乱,引起了北方人口大量向江南迁徙,佛教也随之移动。道安、慧远是著名的佛教学者,师徒二人原本在太行、恒山(河北、山西之间)地区从事佛教活动,“改服从化者,中分河北”,在黄河以北有极高的声望。然而接踵而来的兵灾使他们难于安生。冉闵之乱起,道安以“寇贼纵横”,“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”,迁至襄阳。十余年后,后秦苻丕以十万之师攻襄阳,道安被拘回长安,慧远“与弟子数十人”南渡长江,来到庐山,在江州刺史桓伊的赞助下,建东林寺,讲说佛法,“昏晓不绝”。慧远说佛,参用老庄,以传统的道德思想来文饰附会,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,因而更易被儒者接受,获得统治阶级的重视,于是被打散伤残了的“释迦余化,于斯复兴”^⑪。佛教以庐山为据点的复兴,为以后在江西全境的泛滥打开了局面。

得阳居四方之中,交通便捷,庐山险峻青秀,尽有江山之美,梗香药灵,烟岚幽邃,实

为修禅定止观的圣地，得悠闲极乐的净土。更兼东林慧远的名声已经在外，各方高僧遂都乐意来往。例如，佛陀跋陀罗，北印度人，在长安与鸠摩罗什齐名，应慧远的邀请，上庐山居住，译出有关修禅的专著，给慧远以很大的帮助。僧伽提婆，北印度人，著名的佛学大师，为慧远请至山中，译写经论，在山名僧都相从研习。晋宋之际的中国高僧道生，从鸠摩罗什游学多年，研习佛教经义不受语言文字的束缚，独立思考，提出“顿悟成佛”，“一阐提人皆得成佛”的创见。当时守旧的庸僧排挤他，不久，《涅槃经》译出，果如所言，方才佩服。传说他在虎丘山中对着石头讲经，每当说一阐提皆有佛性时，群石为之点头。他先后两次入庐山，讲《涅槃》，听众悟悦，涅槃学从此盛行流传。梁代佛教史学家慧皎，避侯景之乱，迁居湓城（九江），死后葬于庐山。真谛，西印度高僧，梁大同初年来华，适当战乱，流寓各地，先后在豫章宝田寺、栖隐寺，新吴（奉新）美业寺，以及南康县居留，他随方讲说瑜伽学，开创了中国瑜伽学系的规模。天台宗祖师智顗，陈亡后上庐山居住，数年后去扬州，隋炀帝杨广尊称他“智者大师”。金陵六代，代促时薄，政治倾轧厉害，浔阳往往是政治、军事上的缓冲点，庐山成为僧俗各界人物歇脚之地。

正是在江南佛教人事活动频繁时期，禅宗的基地不断南移。达摩定居河南登封少林寺，活动主要在北方。二祖慧可仍旧。三祖僧灿则移居安徽舒州皖公山。四祖道信，在隋灭陈之后，领徒众从皖公山南下入赣，落脚吉州，进入江西腹地。五祖弘忍，聚徒于家乡黄梅，与赣北毗邻。六祖慧能，在韶州（广东韶关市）曹溪定居，与赣南接壤。禅宗四代祖师，一在江西内地，三在南北边界上活动，其声气影响集中于江西是很自然的。慧能开始传法不传衣，让大弟子各立宗派。这时又正值安史之乱发作，叛乱刚平，藩镇割据复起，前后延续一二百年，南方的江西，再次是相对平静的避乱之区，一方面继续有僧自北方来，如新淦龙安寺，是在渔阳鼙鼓之变的时期，由长安讲僧建立的。另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，南宗禅的大小宗派多就近占据江西的山头，则是大势所趋，环境促使而成的了。

禅宗本身的特点，使它更易在江南传播，在江西繁衍。禅宗不同于其他宗派，不死守天竺教义旧说，敢于提出一些异端见解，摆脱旧经义、旧戒律的束缚。范文澜同志指出：“禅宗获胜的原因，主要是自立宗旨，不依傍他人，放弃天竺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，装上中国士大夫常见的普通相貌。”^④ 诸如人心皆有佛性，净心自悟，即可成佛，不必念经做功德，也不须守戒苦修行，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“求佛求法，看经看教，皆是造业”，“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”^⑤。这些新出的见解和主张，在佛教旧传统势力强大的北方地区难于流播，而在相对薄弱的江南地区传播，就不会有多大的阻力。

再者，以前僧徒们多在通都大邑建寺造塔，与世俗官贵同样进出官府；禅宗从初祖到三祖多游方在外，随缘而住，四、五祖以后，变为山中定居，远离都邑的嚣尘，利于净心悟道。——也是避开乱世政治风云的表现。后来的马祖、怀海等人，进而发展为农禅结合的生活。山清水秀，多灵岩幽谷的江西境内，自然符合他们的要求而乐意居止。唐人许容游余干古大寺，写诗道“寺古人稀到，林深鸟不知。烽烟飞法座，猎火照金毘。处处遭兵燹，家家苦岁饥。老僧忘世念，反笑我来迟”（《江西通志》卷124）。

从隋唐开始，江西开发速度加快，地主经济日益活跃，由于前一历史阶段上的世家豪族势力相对薄弱，新兴地主势力得到较多的发展机会。这批人基于经济利益上的奢望，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，竞相造寺饭僧，大做功德。前述的欧阳文长是轻财乐施的丰家巨族，再如南

城崇觉寺，“军教练使吴臻，家故饶财，心且喜事，由景佑中始谋营建”。高安“郡人有吴智讷者；治生有余，辄尽之于佛”。宜黄义泉寺，“唐成一施田创建”，湖山院，天佑中“罗贤施田创建”。崇仁普安寺，“南唐时邑人邓进兄弟重建”。永丰广济寺“蟾塘张宣义舍地建。”峡江顶山寺，“里人王周佐施地建寺。”萍乡宝积寺，“县民李氏施其地创为寺，”等等。”（均见《江西通志》寺观）。吴臻造寺在北宋，但富家好佛的事，是早已有之，可资参考。既然官绅大户尽财事佛，和尚们当然乐意来这里净心自悟，饱受清福了。

禅宗，特别是南宗禅的兴起，对困于极其繁琐的经义和戒律之中的佛教徒是一种解脱，因而很快取得了压倒其它宗派的优势地位。然而沿着人皆作佛、不守戒律思想不断发展下去，宗派就要瓦解，必将否定自身。禅僧们一个个既无世俗烦恼，在“卧云深处不朝天”，又少戒律束缚，能“一任清风送白云。”这种完全自在的寄生生活，不可避免地要蜕变堕落。就在唐代，禅僧们或嗜酒吃肉，或经营财利，或寇盗淫乱。拾得和尚说：“我见出家人，总爱吃酒肉”，“我劝出家辈，辄莫染贪淫”^⑥。都是些“口虽说空，行在有中”的口头禅。为了阻遏蜕变，挽救宗派，产生了约束禅僧的要求。适应这种要求的《禅门规式》，产生在禅僧集中的江西。怀海在这个规式中，对禅宗寺院的僧职、制度、仪式等等作出具体规定。以前禅僧多住在律宗的寺院中，没有自己的规章制度。现在别立禅宗寺院，以禅法最高深的僧人为长老，住在方丈；其他僧众住僧堂；长老说法，僧众站立两边恭听；还规定寺中僧人要劳作，怀海本人“作务执劳，必先于众”，甚至提出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要求。怀海的《禅门规式》在宋代失传，元朝时候朝廷令百丈山德辉和尚重新编订，于惠宗至元元年（1335年）颁行，名《百丈清规》^⑦。与此同时，还吸收其他宗派的一些思想，修正自己原来的主张；慧能“不立文字”，他的后继者则不断撰著语录、公案之类的文字；佛教原来的戒律也逐渐采用一些。禅宗逐渐融合了其他宗派，中国佛教又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。

佛教，尤其是禅宗在江西的广泛流传，对江西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经济上是增加了一大批寺院庄园和僧侣地主，在世俗剥削阶级旁边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佛教寄生阶层；思想上，佛教腐朽的唯心迷信思想，流毒社会各个阶层，严重地麻痹着劳动人民的意识，束缚了劳动人民的手脚；文化上，禅宗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，儒佛二者之间素来是互相补充、互相渗透的，宋代的理学，尤其是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，与禅宗的紧密关系更为明显。例如陆九渊说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、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”，他教学生们发明本心之理，不要陷溺在繁琐的书本文字之中。因此，陆学又称“心学”，朱熹学派的人攻击陆学是说禅，陆九渊回敬说：“易简功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”^⑧。书院是理学发展的组织形式，江西的书院，在全国也是居于首位。禅寺多在密林深处，书院也依山林即闲旷；禅僧喜欢游方参学，书院实行讲学制度；至于精舍、方丈、山主等名号，更是混用。禅宗与理学，寺院与书院，声气相通，情景交融，前后发展，都以江西地区为重要的活动舞台；寺院经济作为封建经济的特殊形态，佛教作为封建文化的特殊形态，都有过重大的发展，在江西地区历史上，在我国古代经济、文化发展史上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我们不可不多加注意。

（下转第55页）

误,同时也可以充实古代舆图的内容,前人所谓杜诗是“诗史”,所谓“少陵诗卷是图经”是很有道理的。我们认为,仅就杜甫入岳州后不到两年的创作,无论是内容还是题材都是极为丰富广阔的。其揭露社会的广度,“知民疾苦”的深度,既不是王、孟、高、岑所能企及,也不是李白、白居易所能媲美的。

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个人遭遇与人民苦难紧密联系在一起,指出“彤庭所分帛,本自寒女出”,“不过行俭德,盗贼本王臣”的伟大诗人。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强烈而深沉的,其感人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。正如刘熙载所说:“杜诗高、大、深,俱不可及。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,为高;涵茹到人所不到涵茹,为大;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,为深。”^②而其忧国忧民的诗歌尤其如此。杜甫早年既不同流合污,也不逃避现实,不在其位亦谋其政,穷不独善其身的斗争精神,从未因老病而衰颓。“监河受贷粟,一起轍中鳞”^③,“右臂偏枯半耳聋”,“悠悠伏枕左书空”^④,由此可见,杜甫入岳州后,不仅生计极度维艰,而且行动也十分困难,右臂瘫痪了,他的诗歌创作都是用左手写下的。“卢绾须征日,楼兰欲斩时”^⑤“斯文忧患余,圣哲垂彖系”^⑥,“留滞才难尽,艰危气益增”^⑦,为了坚持政治理想,为了发展文章事业,杜甫在重重困境中奋勇前进,直到生命的尽头,这种穷且益坚老而益壮的高尚情操和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。“自有凌冬质,能守岁寒心”^⑧,“岁老根弥壮,阳骄叶更阴”^⑨,可以用来赞颂杜甫的晚节。象杜甫这样言行一致,善始善终,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,晚节弥香的诗人,在历史上是仅见的。

“岁云暮矣多北风,潇湘洞庭白雪中……万国城头吹画角,此曲哀怨何时终?”杜甫为祖国忧患,为人民疾苦歌唱了一生,真是“忧国忧民,死而后已!”

注:

- ①《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》 ②《北征》 ③《李白与杜甫》136页 ④《有感五首》
⑤《吾宗》 ⑥⑦《枯棕》 ⑧《暮归》 ⑨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三 ⑩《归梦》 ⑪《奉先咏怀》
⑫《壮游》 ⑬《同元使君春陵行序》 ⑭《同元使君春陵行》 ⑮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二
⑯《诸将五首》 ⑰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卷五之四引 ⑱《临洞庭上张丞相》 ⑲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卷二十引
⑳《示儿》 ㉑《艺概》 ㉒《奉赠萧十二使君》 ㉓《清明二首》
㉔《暮冬送苏四郎偕兵曹适桂州》 ㉕《宿凿石浦》 ㉖《泊岳阳城下》 ㉗李元操《园中咏桔》
㉘王安石《孤桐》

(上接第36页)

注:①《刘梦得集》卷30《袁州萍乡县扬岐山故广禅师碑》。 ②《资治通鉴》卷249、宣宗大中五年六月。 ③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124 ④中华书局,1981年版《李觏集》卷24,〈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〉引。 ⑤玉山县1956年统计,全县僧尼23名,而在家的佛教徒316名。由今及古,可作为分析问题的参考。 ⑥《李觏集》卷24〈太平兴国禅院什方住持记〉。按,唐天祐无丙子年,如果是杨昊的天祐丙子,则为公元916年。 ⑦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122。 ⑧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125、崔黯〈复东林寺碑〉 ⑨宋、李元中《莲社十八贤图记》。 ⑩《李觏集》卷24、〈承天院罗汉阁记〉。 ⑪《柳宗元集》卷6、〈大鉴禅师碑〉 ⑫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121、张商英《黄龙崇恩禅院记》。 ⑬《高僧传》卷5释道安传,卷6释慧远传。 ⑭范文澜《唐代佛教》,人民出版社、1979年版、第67页。 ⑮《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》,见《唐代佛教》第284页。 ⑯转引自《唐代佛教》,第90页 ⑰参见《中国佛教》(二)第222页“怀海”。 ⑱《象山集》卷35、22、25。